

王安忆《向西,向西,向南》

# 寻找灵魂的依傍

□王 宁

王安忆的《向西,向西,向南》是2017年度汪曾祺华语小说奖获奖中篇小说。小说围绕着女主人公陈玉洁从中国到德国再到美国,一路向西、向西、向南的人生轨迹,书写了在当下现代化、全球化时代背景之下,作为个体的中国人如何承受着时代对人精神世界的改变,如何体验复杂难言的人生况味,而在这个身份角色似要迷失的过程中,又是如何反抗失意与彷徨,坚定地寻找属于自己的灵魂之依傍的故事。

作为小说大家的王安忆,显然有足够的自信凭借时代生活的“另一侧面”反映这个时代“普遍性”的问题,小人物或平静如水或百转千回的命运折射出大时代的深刻社会变革。因此她以松紧合度的叙述节奏,看似不经意的枝枝蔓蔓,将起承转合颇具中国味道的故事娓娓道来。

故事开端镜头回至上世纪90年代的柏林,女主人公陈玉洁与徐美棠的初识。一个是理性智慧体制内沪上女白领,一个是16岁时靠偷渡闯世界、经过沧桑又带着热辣辣生命温度的青田老板娘。那种海外异乡中餐馆里不期的邂逅,甚至彼此不知姓氏名谁的惊鸿一瞥,为日后二人的惺惺相惜埋下了伏笔。

时光流转至新世纪,小说追随着陈玉洁的脚步再向西到达美国纽约。作为准确把握全球化时代经济脉象,率先下海的一代民营企业企业家,陈玉洁一家迅速成为富裕阶层,但是在新世纪新一轮的经济洗牌当中因“暧昧的受益最终造成的身份的尴尬”而重新寻找新的商机,同时也是规避风险向境外转移资本和财富。小说的笔触首先指向,当这一群体的人富裕之后,当钱不再成为问题,人与人之间最宝贵的亲情关系是如何被疏离、蚕食与摧毁的。

当陈玉洁一家因女儿就读于纽约的大学而多次往返美国时,财富资本、生活习惯、语言交际早已在全球化时代不会成为出国的障碍,那么生活的障碍又是什么呢?真正的障碍在丈夫、女儿代表的决策性力量在美国买房定居后显现。这实则隐含着爱情、亲情在这种日益膨胀的财富浸润之下的变质,进而衍生出的“恶之花”。随着情节的渐次推进,我们看到了表面上慷慨大方、夸夸其谈,自有一套经济理论的丈夫,似乎永远站在财富的至高点上俯视全球经济,其实他早已背叛了妻子,与叫做维维安的小三儿在香港共筑“爱巢”。他积极地在纽约为妻子购房实则是变相地抛弃妻子;为妻子女儿生活、留学付出的高额费用无非是令自己不安的良心得以些许平复。这个在小说中着墨不多、多以幕后操纵者身份出现的丈夫形象,似乎代表美国生活中一种司空见惯的人,面目清晰又模糊,极具代表性,可憎的“先富”而“无情”之人,总是在为自己的行为寻找合理性,其实是在掩盖人性的卑劣一面。同时他又在小说中外化为女

性生存艰难的叙事背景,成为女性逆袭故事的预设。也许在全球化大潮面前,这对夫妻的悲欢离合故事实在平常不过。智慧、理性、独立的妻子陈玉杰绝不是依靠丈夫的女人,但那一份身处异乡的寂寞真空与身份意识的模糊认同感,以及由此带来的孤独感,依然伤害了她的内心。小说中还用不少笔墨写了陈玉洁与女儿这样一对“亲中有疏”的母女,更印证了观念、代际的差异,对天然血缘关系的破坏。因为父母创业时期无暇顾及女儿的成长,当终于有一天可以给她锦衣玉食的生活时,却发现已然亲情淡漠,又有代际的差异总有难于理解和沟通的一面,纵然有彼此的关心,终究不能用最妥帖的方式表达,而心存隔膜。这二者带给陈玉洁的命运荒凉感,成为其与徐美棠阴错阳差的命运对接的心理基础。

纽约布鲁克林“牛铃”中餐馆里陈玉洁与徐美棠“人生何处不相逢”的再度邂逅,则开启了“佳人双浴火重生”的机缘。这里我们姑且不谈女性主义所谓的“姐妹情谊”,不想为故事而生硬地搬运、套用西方的理论。单就故事本身而言,陈玉洁与徐美棠因由命运的巧合安排、个人的主动选择,而结成了惺惺相惜的“命运共同体”,说到底,还是中华传统文化价值观念支撑之下,以中国人惯常的独立自主、自强不息的精神做根基,不断寻找灵魂的依傍,确认自我价值实现的表达;同时亦是个体的中国人于世界现代化洪流之中寻找安身立命之所在,从而进行自我拯救的过程。

记得巴西电影《中央车站》的宣传语是这样写的:“一个孩子去寻找他的家,一个女人在寻找她的心,这个国家在寻找它的根。”这部影片被影评人称为“世界上最好看的电影之一,一部具有现实主义风范的温情小品,一段悲悯旋律下的自我救赎之路”。影片通过叙述女主人公朵拉带着素不相识的男孩约书亚千里寻父的故事,表现了巴西社会在工业化浪潮中,传统文化、道德、信仰逐渐地被现代文明入侵,人们心灵的迷茫、阙如、无所适从的状态。而两位主人公在南美广袤大地上的行走则完全可视为一代心灵的寻根之旅,在行走中,他们渐渐解开心结,正视伤痛,人性的温情慢慢复苏,找回失落的自我,也成为一一个民族于乡野中找回自我根性的巨大隐喻。在行走中完成寻找,完成灵魂的皈依,成为许多作家、艺术家愿意借鉴的表达方式。而陈玉洁与徐美棠从中国大陆到柏林、纽约,再到悉尼文,一路向西,向西,再向南,看似平常的生活面前,实则是追寻自我文化身份、自我价值、人生角色定位的内驱力而不断前行的。当生活的一个侧面被颠覆,作为内心恪守传统中国文化、同时又接纳了全球化视野的人群,她们可能短暂地迷失于变幻与离乱,但很快就会调整,会满血复活,她们鲜活、跳脱的生命力,代表着我们这个民族生生不息的生命原动力。

## 草原上的歌者

□杨志学

傅丽祯《一个人的草原》

我和傅丽祯的认识实属偶然。2015年夏天,在草原最美的时节,我到乌兰察布参加由当地文联与《草原》杂志社联合举办的草原诗人作品研讨会。当时小傅是以工作人员的身份参加会议的。她的热情周到、乐于助人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后来了解到,小傅是当地文化部门的一名干部,曾因工作成绩突出多次荣获乌兰察布市和内蒙古自治区“三八红旗手”、先进工作者之类的称号。再后来又发现,她也是一位诗歌的痴迷者和写作者。

这位草原上的歌者,不仅人好,而且她的诗歌也是写得很有特点的。我之所以称傅丽祯为草原上的“歌者”,是因为她的诗具有可歌可唱可诵的特点。我国最古老的《尚书·舜典》中即阐明诗的本质如下:“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这里的12个字言简意赅,对诗歌本质特征的概括可谓精辟而全面,可惜我们今天似乎只记住了“诗言志”3个字,而忘记了后面的9个字。当下许多人写诗,只知道抒情言志(更有甚者连抒情言志也不讲而一味叙事),而忘记了诗歌的表达还需要讲究声律的特点。但也有一些诗歌写作者依然不放弃对诗歌的节奏韵律的追求,傅丽祯是其中的一个。从诗的起源和发生看,音乐性乃诗歌的基本属性之一。现在的诗歌在脱离“歌”的道路上已经越走越远了。为了矫正诗歌日益散文化的倾向,重新强调诗歌的节奏韵律仍然不失为一种有意义的举措。傅丽祯生活在塞外草原,对诗歌的美本就有自己的理解,加上蒙古族能歌善舞习俗的浸染,益发强化了她对诗歌音乐性的体悟与追求,她笔下的诗行,也便充分显示了节奏的起伏和韵律的跳荡:“一针针短一针针长/针针绣在她心上/一针针蓝一针针黄/情情绣出风求凰”(《绣花姑娘》)。这是从诗人心中流淌出来的歌。这样的节奏韵律与诗人内心奔涌的情感相适应,所以显得比较自如,同时也具有较强的表现力。这样的诗,是对我国传统诗歌美学的汲取,它不仅可诵,而且也应该是可以唱的。据说,傅丽祯的一些诗歌曾被作曲家谱曲传唱,便是明证。

傅丽祯的诗歌感情真切饱满,一唱三叹。这在她几乎所有的诗歌中都有体现,而在她大量的爱情诗中表现得尤为突出。这部诗集的第一辑“风的私语”中的作品便多属爱情诗。其感情的表达有时委婉,有时也不免有些直接,但都体现了诗人感情世界的丰富与美好,也体现了诗人作为女性的细腻与温存。陆机《文赋》云:“诗缘情而绮靡。”《毛诗序》亦云:“情动于中而形于言。”都道出了诗歌缘于情而发、发而为言

难免华美的属性和特点。傅丽祯的大量诗作就是如此,它们可以说是作者以情动人诗学观作用下的产物。应该说,在当下口语诗泛滥、许多诗人放逐抒情的语境下,傅丽祯坚持诗歌的抒情传统,书写亲情、友情、乡情、爱情的美好,自有其可贵和值得肯定的一面。她的诗里,许多质朴无华的咏叹,许多心灵独白式的倾诉,是可以引发读者的共鸣,并促人思考“世间情为何物,直教人生死相许”的千古命题的。有时候,作者也很注意调动表达方式,展现出别样的情感天地:“你和风雨无关/风雨和你无关/花草和你无关/整个世界和你无关//你离开就离开吧/还留下这么多痛给你人/惹得风恸雨泣”(《忘记和你有关的日子》)。像这样的表达,找到了外物与心灵的契合点,把感情放在与客观世界的关系中来呈现,收到了意想不到的艺术效果。

作为草原的女儿,傅丽祯为草原献上了一首首动人心弦的歌。这集中体现在诗集的最后一辑“草原素描”中。我们看到,在这些关于草原的诗作里,作者很擅长大笔勾勒出类似“苍苍野茫茫”的壮丽景象:“草连天边 歌行万里/马头琴绕过青山的脊梁/绿海中徜徉/姑娘的牧歌旷野上飘荡/马背上的汉子鞭梢留香”(《草原素描》),感情是激越而豪放的。在这样的天地间,人的愁闷一扫而光了。有时候,作者也擅长以细腻的笔触描摹草原上的事物,如《草原清晨》这首诗,宛如一幅生机勃发的草原晨光图,惹人喜爱!这里,既有远距离的全景式展现,也有近距离的场景聚焦。诗的第三节更是清新委婉,对“雄鹰”和“挤奶姑娘”的描写十分传神,成为全诗的一个亮点:“一只雄鹰缓缓滑翔/停落在木筏上/它若无其事的样子/惹得挤奶姑娘目光惆怅”。这样的细节捕捉和场景描绘,让整个画面都动了起来,同时这样的动又没有破坏静,还烘托着草原清晨的静,可谓静中之动。作者用笔也比较节制,诗的结尾是以无声的画面收束,让人凝神遐想,收到了“含不尽之意见于言外”的效果,可谓得含蓄之法。

草原上的歌者——傅丽祯,立足塞北草原,极目大千世界,以一颗敏锐和感恩的心,歌唱草原、家乡和人间一切美好的事物,表达着对生活的热爱。她从诗歌传统中汲取营养和力量,秉持纯正的诗歌品味。她的诗,题材广泛,形式多样,语言质朴奔放,融豪情与柔情于一炉,写真情,言真爱,展现了一位现代女性深情绵渺的个性追求和开阔明亮的精神世界。

## 文学评论

从打工妹到餐馆老板娘的徐美棠,令人想起了《北京人在纽约》中的阿春,似阿春,又不似阿春,她少了阿春的凌厉,又比其多了自信洒脱和艳丽迷人,她是可以制造任何传奇的佳人,这样的在异国中餐馆的老板娘有千千万万,为何独有美棠令人魂牵梦萦?这“元气丰沛”的充满人间烟火性的性情女人,不惑之年,却已饱经沧桑。她的爱恨情仇都在作者看似不经意的对话、白描之间表现得淋漓尽致,唱念做打十八般武艺,她样样本色、当行。多年的海外生活令异国文化已经不再成为她生活上的障碍,她自信于华裔的身份,还常常揶揄调侃异国文化难于理解的地方:“德国人很奇怪,脑筋有毛病,我们和他们,完全是两种人类。”“到处是我们的人……全世界的经济命脉掌握在谁手里?……温州人就是中国的犹太人。”“洋人的脑子里有毛病,他们相信文书……就不相信眼睛,这是一种有病的人类!”经过全球化、现代性从观念到生活实践的洗礼之后,新一代移民在身份意识和文化自信方面已经大大超越了改革开放之初的处于弱弱的、对西方探索式的心理定位,异国、异乡不再那么生疏,更显示出民族与民族之间整合融合之下的心理接纳。这点上,也足以体会到作者鼻息的敏感和对时代的把握力度。

这正是徐美棠超越阿春一代的地方。她可以为求身傍嫁老头,也可以与她小10岁的福建人相亲相爱,为治疗他的绝症而倾其所有,却没有留住爱人,她从老板娘再一次变成经理兼大厨。“要崩溃,才能救自己!”她尝尽了作为一个女人所有的艰辛与伤痛,却在“崩溃”之后,能够自救。陈玉洁更是在不断地走向徐美棠内心深处过程中,被吸引、被触动、被唤起,唤起的不仅仅是同病相怜式的深切的同情,更是发自人性内在的自我实现的需要,作为一个女人独立的社会身份与文化价值的体现!她毅然放下身段去做跑堂,后又与徐美棠一路南下到小城圣迭戈,买下台湾老太婆的饭店,二人相守,些许沉寂,却活得踏实,灵魂有所依,生命才不至于坠入虚空。

还要提及一下,潘博士在小说中始终是个隐喻,这个香港富商的儿子,从德国到美国,出现不多,却暗暗如影随形。他传播福音却无法说服有着“强悍的性格”和“知识的力量”的两位女主人公。他终究是向着阳光,追寻着地平线,做着“游僧”。他不顾形单影只,为信仰而寻找,为灵魂而行走,又何尝不是陈玉洁与徐美棠一路追寻的另一个版本呢?

记得张爱玲在《〈传奇〉再版序》中写过:“将来的荒原中,断瓦残垣里,只有蹦蹦跳跳花旦样的女人,她能够夷然地活下去,在任何时代、任何社会里,到处是她的家……”仿佛为我们的主人公陈玉洁与徐美棠,前世今生,悲欢离合,提前做了注释。

北乔《临潭的潭》

## 拾物自富与孤独静思

□姜 超

从京城到临潭挂职的北乔,多年前就已在文学艺术领域多次跨界,凡散文、小说、评论等文学艺术形式均有建树。一年前,北乔突然拿起诗笔来,这次跨界决计没有“影响的焦虑”,也不曾思考“我说”与“他说”的复杂纠缠关系,在一年时间出版厚达340多页的优秀诗集。北乔的诗性篇章将自然的赏赐和馈赠收纳于心,促使那些景色走入“境界”。如他本人所说:“我深信,是高原为我提供了写诗的内在动力和外在叙述语言。高原,才是最伟大的诗人。”他描绘的临潭有别样的景色,总有意想不到的精彩令人快意与惊奇。

海德格尔说:“因为孤独具有独特的力量,它不是把我们化整为零,而是促使整个生存条约变得接近万物的本性。”身在荒野的诗人才有激赏原始风景的资本,临潭独特的地理位置赋予了北乔身在荒野、心居孤独的气息。“高原在哪?高原在我们的身体里。所不同的是,身体不一定告诉我们高原的存在,但灵魂会不时地提醒,我在高原。”事实上,北乔难得有更多的机会亲探王安石推崇的“奇伟、瑰怪、非常之观”,不过他内心总有观其险远之殊愿。他描写的大自然不曾污染或未被破坏、处于粗粝的原初状态。诗歌中的描述对象较少小腔小调,一种西部苍茫辽阔感跃然纸上。北乔自觉选择做一个静思者,而且是我放逐的孤独者。他躲闪着都市的慌乱,沿着雄性美的风景奔走。此种对原始野力的赞咏,具有壮丽的色彩,其暗含的崇高美,是对真生命的呼唤。

北乔诗歌里的心灵经验累积,总是要借助于身体的感知才能贴近心灵的自由。北乔驱策内在的“意”和外在的“境”高度融合,引领诗意达到“意境深远”的要求。如《聆听青稞拔节的声音》一诗,北乔仿佛进入,让物与物融

“八一”前夕,原成都军区副司令员石香元中将的诗集《翔远心曲》,由人民出版社出版。捧读石诗,兴奋不已,可以说:香元诗作,首首悦目,句句赏心,既可给人以大美之享受,又能给人以哲智之启迪,还能给予力量之激励,更能给予高德之滋润。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文联十大、中国作协九大开幕式上的讲话中曾有四句话:“胸中有大义,心里有人民,肩头有责任,笔下有乾坤”。这是对广大文艺工作者的要求,也是对优秀作家、诗人的总结,也是香元诗集的追求。

“胸中有大义”。墨子云:“义者,利人利天下也。”“天下有义则生,无义则死;有义则富,无义则贫;有义则治,无义则乱。”香元的诗作中就充满大义。如:“系列讲话就明灯,特色理论又一峰。百年复兴圆梦梦,千秋伟业获新生。莫尔空想幽灵争,马列实践斧钺腾。苏共模式输僵化,北京共识集大成”(《千秋伟业获新生》)。这是诗人在国防大学参加总部举办的高级将领培训班,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后的由衷感慨:“千秋伟业获新生!”其强军兴国之大义,跃然纸上。诗人对《共产党宣言》“百读不厌共产党篇,千遍始得发言权。幽灵幽荡主义定,肤白肤黑铁手联。工人阶级有道义,资本铲除无恶源。全球响彻国际歌,世界飘红尽齐辉。”(《主义颂》)信仰坚定,大义凛然。即便是卸职解甲,也时刻牢记:“羔羊跪乳君子义,烈士断头保国臣。伫倚常怀千里志,补天当献硕石身。”(《解甲更思领路人》)

“心里有人民”。诗人从战士到将军,从基层到军区,始终秉承“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党的宗旨。在其诗词中,占其主导地位的自然人民。“依靠人民是党根,造福群众是立本。胸怀多数是铁律,解放全球是大真。”(《四是诗》)诗人在该诗的注释中写道:能不能做到这四,是“衡量真假共产党、真假马列主义的试金石,也是对‘为人民服务’深刻含义的基本解读。如果说‘万岁’这个词可用于人类,那么我敢肯定,只有毛泽东喊出的‘人民万岁’乃是永恒的宇宙真理!”

“肩头有责任”。诗人2006年出访欧洲,得知被军委任命为沈阳军区副司令员的消息,遂即兴赋诗《赴东北》:“共产党员一块石,东西南北任党支。千年碑硬贝成宝,万载琥珀木化磁。人过有名言贵久,雁去留声难声推。五湖放眼成关外,四海为家主义滋。”“共产党员一块石,东西南北任党支”蕴含着强烈的忠诚意识、服从意识,而“五湖放眼成关外,四海为家主义滋”,则体现出诗人强烈的责任感。“十日深蹲红军连,中将挂上

石香元《翔远心曲》

## 胸中大义 笔下乾坤

□贺茂之

列兵銜。黎明号响操场勇,暮夜灯熄粗细谈。牢记八一红旗染,深悟三湾制改编。强军力成客里空,脚踏实地一脉传。”(《蹲点》)更是强烈责任感的亲身实践。对于一位具有高度认知的高级将领,体现强烈责任感的实践无处不在。“半月狂奔三十营,老马奋蹄昼夜行。川渝秘访凯旋将,云贵速查集骡兵。两军久战胆气赢,四旅新编战技精。军民融合五省颂,亮剑西南四海名。”(《跑面》)

“笔下有乾坤”。即不仅是从诗中看到乾坤的形象,更能感受到诗人乾坤的情怀。“笔走龙蛇贺新春,枪随党心铸军魂。文攻智消商女恨,武备勇敢霸王孙。内忧稳除舌尖弊,外患静观四海云。习文精武乾坤定,强国圆梦可图存。”(《贺新春》)诗人乾坤的情怀,是“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精神体现。“昨日京城艳阳天,普天同庆七十年。今朝暴雨倾盆落,苍天垂泪祭英贤。正义之剑已高悬,和平飞鸽彩云穿。人民意志乾坤定,三个必胜华夏挽。”(《天助中华》)

“笔下有乾坤”,还可以理解为素材广阔、意境高远、语言鲜活、精品叠现,反映出来的思想与精神,“与天地和其德,与日月和其明,与四时和其序。”香元的诗,就具备了这些特点。而在展示这些特点的过程中,诗人善于运用正中直正、平中见奇、庄中见谐、素中见雅、朴中见巧、小中见大、诗中见哲等手法。“正中直正”,即正面颂扬或鞭挞,直奔要害、淋漓尽致。如《老虎苍蝇一起打》:“惊闻巨贪被调查,喜不自禁笑哈哈。擒虎有方入虎穴,灭蝇无计逐蝇蛆。扬汤止沸沸更加,釜底抽薪薪不发。反腐犹如净环境,暴风骤雨连根拔。”痛快淋漓、大快人心,又蕴含哲理。“演兵场建办公楼,鸟语花香绿悠悠。军营不闻喊杀声,沙场怎见冤血流。”(《无题》)则是小中见大。“诗中见哲”,即将哲理警句融入诗中,这是诗人娴熟的手法,也是读者格外喜欢乃至抄写、传颂的诗篇。“弥渡大蒜瓣不分,恰似亲朋一家人。台独分裂相煎急,安知大蒜一统身。”(《独蒜》)形象生动又是小中见大。《诗语有魂》“诗语含情心著魂,搜肠刮肚意难存。悲愤无言词带血,欢庆有声泪迎春。”竟道出了诗的真谛。一首《律颂》,又道出了诗律的常规与技巧。

在我们欣赏诗人诗作的同时,似乎也悟出了一位优秀诗人创作的道路,即:“胸中有大义”是基础,“心里有人民”是根本,“肩头有责任”是动力,“笔下有乾坤”是结果。只要“胸中有大义,心里有人民,肩头有责任”,自然能“笔下有乾坤”。因此,我说石香元的《翔远心曲》,就是为新时代奋进在强军新征程上的将士们扬旗引领、擂鼓助威。